

輯錄體解題形成探析

陳仕華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提 要

解題之作，分為綜述、傳錄、輯錄三體。輯錄之體，後之繼者甚眾。但探討輯錄體解題之起源，歷來學者以《出三藏記集》為輯錄體解題開其先聲，此說乃強為附會。筆者以為其源起與當時發展成熟之集解、類書等文獻類型，及讀書求實求博之精神、史學會通思想、目錄體制之發展等皆有關聯。本文擬就其形成之原因作一探討。

關鍵詞：目錄學 解題 輯錄體

輯錄體解題形成探析

陳仕華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解題亦稱敘錄、提要，是中國目錄重要之體制。其目的在於揭示作者生平，書籍之篇目大旨、內容得失，學術淵源、版本源流等，可指導讀者涉學之途徑。故可稱是中國目錄學之優良傳統。此傳統創自西漢目錄學家劉向。劉向在校理書籍後，即撰寫敘錄一篇，闡述其校勘經過，介紹撰者生平、書之得失等。事後輯為《別錄》一書，此書今雖失傳，但現存《孫卿書》、《晏子春秋》等之敘錄中，尚可見其梗概。劉氏鎔鑄各家之說而以己意綜述之，撰為一篇。故可稱為解題之綜述體。後世之《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總目》等皆屬之。

迨及南朝王儉《七志》出，即為作者「每立一傳」，當作簡單之解題，而不論作者撰述之意。此可稱為解題之傳錄體。《七志》今不傳。此體偏重作者事蹟，於學術卻少發明，故為《隋書經籍志》所不滿^①。而後世之歷史藝文志，偶作小註以傳人，殆襲其意。

解題發展至南宋，另一新體裁出現。馬端臨《文獻通考》全書共分二十四門，《經籍考》在第十八，凡七十六卷。約八十餘萬字，分經、史、子、集四部，五十五類。《文獻通考·自序》敘及「經籍」部分云：

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並

① （唐）魏徵：《隋書·經籍志》（台北：鼎文書局，1993），頁906。

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俱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洞究旨趣；雖無其書，味茲品題，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

馬氏解題博採前人之說，按序排列。輯錄之體，於焉創立。解題之作，既分綜述、傳錄、輯錄三體。傳錄體因不傳，鮮人論及。而綜述體則學者多有論述，如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嘗分析劉向《別錄》之體例；莊清輝《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研究》亦對總目提要之義例有所闡微。

輯錄之體，後之繼者甚眾，余嘉錫亦稱其「體制之善，無間然矣」^②。但對此體之研究則鮮少。探討輯錄體解題之起源，歷來學者以《出三藏記集》為輯錄體解題之源起，此說乃強為附會。因為僧祐收錄序文並無與經目作相關對應之意圖。如無對應關係，應非為前所列之經目作解題工作。就如序中所言「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徵」是藉保存序跋文獻，而使「經出之歲」能明，以免「誦說比肩，而莫測傳法之人」。所錄序跋既無對應關係，則不同於輯錄體於各書之下抄錄序文，緊扣應對，使見其目者，藉序跋而能揭示其書。如此方為目錄解題之意。^③筆者以為其源起當與其時發展成熟之集解、類書等文獻類型，及讀書求實求博之精神、史學會通思想、目錄體制之發展等皆有關聯。本文擬就其形成之原因作一探討。

二、集解與類書等文獻類型之影響

（一）集解

中國傳統文獻纂輯成言的方式，初始於經書之集解。漢代學者為求精確解釋

②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82。

③ 參見陳仕華：〈類書與輯錄體解題〉，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淡江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25-38。

經書，曾三次由朝廷召開會議。俾便集眾家之解說，以解釋群經。至魏有何晏《論語集解》其中所謂諸家，即是苞氏、周氏、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等。至皇侃《論語義疏》除蒐集何晏的《集解》外，更廣泛蒐集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寧、王珉等十三家為江熙所集者。又引了王弼、殷仲堪、顏延之、顏歡、太史叔明等魏晉六朝人之說。迨及宋代，邢昺的《論語正義》因皇侃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

梁任公^④、牟潤孫^⑤、戴君仁^⑥三人都以為義疏雖是漢人章句，以及晉人經義演變而來，與佛家「講說」有關聯。^⑦也與佛典疏鈔的體製相似。而所謂相似，是就形式上的行文編制的科分章段來說，而若從解釋文獻的觀點來看，其實集解與義疏都是大量引用眾人的說法，以豐富解釋的內容。

上述講疏之風，梁、牟、戴諸位學者皆以為與佛家「講說」有關聯，也與中國經書的解釋方式互為影響。但別有一種影響中國註釋體者，就是「合本子注」。合本子注對於佛經異譯與註釋有極大方便，也影響中國的註釋之學。^⑧魏晉時期受此影響者以史書最多。劉知幾認為有違史法，造成「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的現象，所以「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⑨。但從廣蒐文獻，辨別異同，加深對文獻的理解，這個角度來觀察，「合本子注」自有其用處。裴松之《三國志注》就用了這個方法。史學家陳寅恪認為這個史注方法就是「合

④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飲冰室專集》（上海：中華書局，1941），頁59。

⑤ 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新亞學報》4卷2期（1960年2月），頁353-415。

⑥ 戴君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的性質和形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3卷第3、4期（1970年10月），頁1-7。

⑦ 戴氏認為：「義疏本是講義，以口說之故，不厭其詳，以致如此。這在儒佛兩家注疏情形相同，究竟是誰影響誰，不易劇定。因為儒家義疏出於漢人的章句，本已有極繁重的。……所以這種繁冗作風，我們不能肯定他來自佛典。但儒佛二家經疏，彼此之間，有相互的影響，則可以斷言。」同註6。

⑧ 參見周生杰：〈合本子注疏論〉，《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6年），頁41-46。

⑨ （唐）劉知幾撰，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頁169。

本子注」體，亦即同原異義，合諸異義，列爲子注，以注於一較善之本。¹⁰對於「宜存錄」、「有乖雜」、「不能判」的文獻一概抄錄，以便「備異聞」，展現在文獻取材上，就是求博的精神。裴松之的注文內容常兼有註解與評史的作用，所以對諸家的史評，每每加以引用，如常引孫盛、習鑿齒、徐盛、魚豢、干寶、虞喜之言。若以爲議論允愜，就不再論斷。這種既已適妥論斷者，就不必費詞多言的原則，是一種尊敬前賢的精神。但如認爲所說未愜其意，後面就有「臣松之云云」來申論，以便發抒己意。

裴松之注《三國》引書甚多，約有 245 種¹¹。所以宋文帝讚嘆曰：「此爲不朽矣」。¹²除了裴注之外，大量蒐集文獻以作爲註解的情形在魏晉之後極爲普遍。如：世稱「四大古注」，除前述裴松之注《三國》外，尚有酈道元《水經注》、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李善《昭明文選注》。酈道元引書 436 種（經部 84 種，史部 208 種，子部 62 種，集部 82 種）¹³。劉孝標引書 414 種。（經書 35 種，史部 288 種，子部 39 種，集部 42 種）¹⁴而《史記》三家注的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也引書 414 種子種（經部 117 種，史部 269 種，子部 86 種，集部 42 種）¹⁵。李善注《文選》引書多至 1689 種。¹⁶引用浩博的文獻爲詩文集的注釋，尙屬首見。到了宋代朱熹的《四書集注》、《楚辭集注》，黃鶴補注《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鮑彪《戰國策校注》、司馬光《太玄經集注》也都能博引典籍來作訓解，以沾溉後學。

綜合上述，集解之取材是蒐集眾家之語，以便互相補充、辨證。而其注釋之內容：有考證作者生平思想、著書緣起、闡發作品思想、考證補充歷史事實與訓詁名物典故等等。¹⁷至於在臚列各家之說法，若有相互牴牾，或不愜己意時，往往作出按語以闡發申論。

¹⁰ 參見王鍾翰：〈三國志裴注考證〉，《清史補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4），頁 286-297。

¹¹ 見註 10，頁 317。

¹² （梁）沈約：《宋書·裴松之傳》（台北：鼎文書局，1975），卷 64。

¹³ 鄭德坤：《水經注引書考》（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頁 3。

¹⁴ 沈家本：〈世說注所引書目·序〉，《沈寄簃遺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頁 817。

¹⁵ 程金造：《史記索隱引書考實·序》（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

¹⁶ 董洪利：《古籍的闡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 13。

¹⁷ 參見董洪利：《古籍的闡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頁 158-231。

另外在書籍形式上，義疏與經注本來是別行的，後來爲便於閱讀才有注疏合一之本。《禮記正義》後有宋紹熙三年（1192）三山黃唐跋：「六經義疏，自京蜀監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他經讀闕。」今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之宋浙東茶鹽司本《周禮注疏》，爲最早注疏合刻本。¹⁸而起於宋代的目錄之輯錄體解題，薈萃群言在一書之下，在形式上也是爲便於文獻資料之閱讀。二者編排文獻的意識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類書

《四庫全書總目》類書類小序云：「類事之書，兼收四部，而非經、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內乃無何類可歸。」此種產生於六朝的文獻類型，其編製的特殊性和內容之廣泛性，由此可知。論其淵源，分類標目的《爾雅》和兼綜眾家的《呂覽》，都有類書的特質。而《史》《漢》的編纂，在紀人之後，又有關於史料的八書、十志，實際上開啓了以類隸事之類書之體。而漢代辭賦重視辭藻，亦必博聞彊記，以供臨文之需。且至六朝時期，紙寫本漸次代替了竹簡，在物質環境上，促成了大部頭類書的編纂。

晉荀勗《中經新簿》置《皇覽》於丙部史記之後，或因視其爲資料史料，故置於此處，可見類書具有資料性質的特點，而編者以主題爲綱，將資料匯集於下，則其對主題之揭示，自當有其方法與體例。

類書之編錄體裁，有徵事者，如《北堂書鈔》；有事文兼採者，如《藝文類聚》；又兼有摺拾字句，以爲事對者，如《初學記》。根據統計，《北堂書鈔》引用之書籍，除集部外，約八百多種¹⁹。《藝文類聚》所引用書籍約有 1400 餘種²⁰，視《北堂書鈔》多出六百餘種。

¹⁸ 參見昌彼得：〈跋宋浙東茶鹽司本《周禮注疏》〉，《增訂蟬菴群書題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 4-17。

¹⁹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68。

²⁰ 中津濱涉：《藝文類聚引書索引》（台北：文光出版社，1974），《藝文類聚》附錄。

至宋，編纂類書之風仍盛。《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同爲一千卷，《太平御覽》據前引之〈經史圖書綱目〉引書 1690 部，尚有雜引古詩、古賦等文獻資料。而《冊府元龜》援據經史，號稱鉅著。其體例大體因襲前書，最顯著不同者，《冊府元龜》在每部之前撰有「總序」，言其經制；每門之前又各有「小序」，述其指歸。此在類書體制上，別具意義：一則表現編纂者之意識，二則欲讀者更深切明瞭主題之旨趣，或敘事之原委。此種體例，影響到《通典》、《文獻通考》等書。

唐宋類書卷帙浩博，取材可稱廣泛，但要處理廣泛之內容，其編纂當自有法。在處理資料的不同方法上來看，類書有四種：純編纂體類書、撮撰成文體類書、編撰合用體類書、考論體類書。^②其中純編纂體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在每個細目之下皆成段排列所引用之有關資料。其資料均出于舊籍，編者沒有加任何考論，也不自敘成文。又考論體類書中之撮撰加考論體類書，如《文獻通考》。在每一子目下，先撮敘有關事實，再加按語，進行考證論辨。此兩項編例，頗值得探討。

由《北堂書鈔》注語之簡約，至《藝文類聚》摘錄片段，類書滿足士子對於資料完整性的要求。而在資料的取得上，不只在書的內容上取得前人敘述、論說，甚且在書的序跋上尋找。如《北堂書鈔》引用孔安國《尚書·序》多達十五條。對於文集之序，亦間有引用，如卷九十八「讀書」中「元帝後宮讀書」引〈王褒集序〉云：「褒字子淵，蜀郡人。有俊才，元帝爲太子，好褒〈甘泉頌〉及〈洞簫賦〉，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至如《藝文類聚》亦引用序跋十餘篇。又如宋祝穆《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儒學部著書」條，即引用如下資料：《朱子語錄》之《評楚辭注》，黃魯直〈書聖俞家藏楚辭後〉、周子充〈跋文梵英華後〉、程泰之〈秘書省書繁露後〉、呂南公〈題王充論衡後〉，此類文章皆長篇鉅製，完全抄入。又如別集卷十「文章部·詩」條，引元稹〈白氏長慶集序〉等十四篇序跋，皆行抄入。宋末王應麟《玉海》亦在編題下，直引序文。如卷五十四「淳熙皇朝文鑑」條下，引周必大序文。又同卷「晉陸機要覽」條下，引陸機自序。利用序文以揭示編題，此種現象極爲普遍。

^② 參見馮浩菲：《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 377-393。

除援引前人論述外，王應麟之《玉海》亦往往於文中間附按注語，如卷一六一引文《文粹》〈起義堂頌〉下案云：「或云：一行撰；或云張說。」又同卷「唐德星堂」下，引《唐書》列傳載宣宗贊歎崔邠、崔郾、崔鄆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其堂曰「德星堂」，並案云：「崔邠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郾類六經要言十篇，上敬宗，治號以寬，蒞鄂則嚴。鄆節度劍南、四川及淮南，文宗時，俱文章。」以案語補充崔氏兄弟之事功。此種體例影響到宋馬端臨《文獻通考》，每個子目之下撮敘有關內容，倘若有說，則低一字加案語。如卷二十九，記述唐登科記總目，從高祖武德年間訖昭宗天祐四年（907），凡唐代二百八十九年逐歲所取進士之總目，下則按語比較唐宋兩朝進士及第之人數，並謂「宋則一登第之後，即爲入仕之期。夫其數之多如此，取之易復如此。則宋之以進士入仕者，其冗當數倍於唐」而致其憂國之感慨。

綜上所述，類書至唐宋，已能博採成段文字，或諸家論記、或各書序跋文字。並在大類下自撰序文，間附案語。成爲涵蓋面廣，有條不紊，又能表現編纂者意見的書籍。當已超越了「臨事取給，用便檢索」、「儲材待用，備文章之助」²²的作用，而進入另外一種層面。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論及類書與目錄學云：

著者認類書爲主題目錄之擴大。蓋分類之道，有時而窮，惟以事物爲主題，彙列參考資料於各主題之下，使學者一目瞭然，盡獲其所欲見之書。此其功用較分類目錄爲又進一步。倘刪其繁文，僅存書目，即現代最進步之主題目錄也。²³

刊成於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的《玉海》即爲此類型之代表。在其各個類目當中，不僅提供豐富之文獻資料，甚或提供文獻來源之圖書目錄。其中「藝文」一門（卷三十五～六十三）即以記圖書目錄爲主之門類。唐宋以來的類書有記圖書

²² 參見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8-20。

²³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74。

典故之「藝文」，無記圖書目錄之「藝文」，《玉海》可謂創例。「藝文」一門分四十四類別，其於每類之下，大抵以年為經，始伏羲以迄宋末，按年代順序。亦有提綱挈領，先列大要者，如諸子類，則先引〈諸子略〉，「漢校定諸子百家」，「漢諸子博士」，「唐十七類子錄」，「唐子書要略」，再引《晏子》、《子思子》、《曾子》等。其排列資料，大多引書。亦有述事者，如書類有「漢尚書三家博士」條，即說明三家博士之師承。又如書目藏書類中有「漢西京圖籍」條，即說明藏書之情形。如此或舉一書，或述一事，以明某類之遷變沿革。

所引資料中亦有自撰之文，如經解類「演諸經通義」條即自擬序文，正史類「唐七十家正史」條、「群書四部」條擬序，一則可以為範文，一則明學術之源流與該書之義例。使亡佚之書可窺其大概。

至於編題所引資料之排列，則不必按時代排列，如正史類「漢史記」條，引〈司馬遷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志〉、〈裴駟集解序〉、〈司馬貞索隱序〉、〈張守節正義序〉、「晁公武」、「呂氏」、「史通」之文，自有其群組。或明篇章，或述義例，或敘著作之由，或補闕遺，則《史記》之大旨，可窺見無遺。亦有子題下，但引書名、卷數、撰者、間有說明，如易類「（宋）周易傳」條引宋人胡瑗等易傳數十種，春秋類「宋朝春秋傳」條引宋人劉敞等春秋數十種，萃集而成，斯可見宋人為《易》及《春秋》作傳之大較也。

《玉海·藝文》編題所引資料，其例有考訂篇卷、明學術變遷、敘著述之由來、論書之大旨及其得失、考作者之生平、記版本、載錄序跋、記載某書引用已亡佚之書、供詞章採錄之文、記後代著述情形等項。²⁴

故其體例仍為類書之體，但卻有目錄之實。更值得注意的是：因是類書之體，故對編題中所著錄之書籍，加以解釋、提示。此解釋、提示即如目錄中之解題。

除了集解、類書文獻類型外，另一個可作發展旁證的文獻類型，即是輯錄之體的方志。²⁵。《方輿勝覽》宋祝穆撰，書成於南宋理宗時（1225-1269），《四

²⁴ 陳仕華：《王伯厚及其玉海藝文部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121-129。

²⁵ 參見吳麗雯：〈輯錄體方志與類書體例之關係〉，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淡江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39-56。

庫全書總目》謂其：「爲於名勝古蹟，多所臚列，而詩賦序記所載獨備。蓋爲登臨題詠而設，名爲地記，實則類書也。」²⁶ 其中就指出其編輯體例，實與類書相近，都是纂輯成言。且往往整首整篇全錄，其卷首有《引用文集》目錄，收錄詩文雜誌，共計一七五〇篇。「其一聯片語不成章者」還不計算。可見收錄的廣博。此種體裁到清代更加興盛，如朱彝尊《日下舊聞》。朱氏《日下舊聞》序云：「所抄群書凡千四百餘種。慮觀者未究其始，必分注於下。非以侈摭採之博也，昔衛正叔嘗纂《禮記集說》。其言「『病世儒勦取前人之說，以爲己出』而曰『他人著書唯恐不出於己，而予此篇唯恐不出於人』」。其後周永年、李之藻所編之《歷城縣志》，章學誠說其「無一字不著來歷」，「乃真仿《舊聞》而劃一矣」²⁷。亦即著眼於博采廣蒐，纂輯成言。

三、會通思想與求博風氣之影響

（一）會通思想

《漢書藝文志》雜家小序云：「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此雜家貫綜多家思想，而成一家之言。但明確的提出文獻會通的概念是宋代的鄭樵，其《通志·總序》云：

百川異趣，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²⁸

又〈上宰相書〉云：

²⁶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873。

²⁷ （清）章學誠：〈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文史通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873。

²⁸ （宋）鄭樵：《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1。

水不會于海，則為濫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²⁹

並云：

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

鄭樵的所謂「會」，是指對史料的綜合；所謂「通」，是指史事記載的時代相續。所謂「會通」，就是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去考察，從千頭萬緒的歷史現象中，描繪出各種事物從古至今的發展過程。並以孔子、司馬遷為例云：

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茲乎。」³⁰

所以鄙斥「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斷代史，而主張「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如此貫道古今，集天下書為一書，旁徵博引的治學方法，造就了《通志》的成就。

受到鄭樵影響的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申鄭篇》衍申其義云：

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

²⁹ 吳懷祺校補：《鄭樵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頁37-38。

³⁰ 同上註。

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³¹

並對「通」字作了詮釋：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爾雅》治訓詁，小學明六書，通之謂也。³²

故知通是可以打破圖書之分類。而其會通的概念與易相關連，《文史通義·易教下》云：

君子之于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為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³³

章學誠由「物之相雜而為文，事得比而有其類」，說明「學者之要，貴乎知類。」知類求道，而類又是為事物自身的特點決定的。由此「象兼六藝」說，提出「學者之要，貴乎知類」由象而類，由類而明道而得道，故云「非類不足以通之」，學術通識者在知類，此為「會通」的思想提出哲理的依據。³⁴《通志·總序》說：「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可見其收錄文獻時間跨度甚大，也能著眼於新的資料。職是之故，鄭

³¹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134。

³²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133。

³³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5。

³⁴ 參見吳懷祺：〈章學誠的易學與史學〉，《史學史研究》第1期（1997年），頁48-49。

樵在圖書分類上也有所更張。鄭樵為展現出學術之博大，將〈藝文略〉分為十二大類，一百家，再分子目四百二十二種。其分類試圖表現出社會結構與意識型態在學術上的反映。於書籍通錄古今，不論其存佚，展現博通的意識。

而此種概念在同代之馬端臨也一樣具備，《文獻通考·總序》云：

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通會因仍之道，讀者病之。³⁵

所以對秦漢以至唐宋的典章制度，若要知「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反映在文獻材料就需要「融會錯綜，原始要終」。

在此會通思想的影響下，出現具會通意義的三大目錄：《通志·藝文略》、《玉海·藝文部》、《文獻通考·經籍考》。³⁶將史志目錄擴展成為通史之藝文志，在敘錄解題的撰寫上，廣引群書，條列學術異同，以求由委溯源，凡能「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都蒐集一處，集眾家之長，也表現其博通之層次。

（二）求博風氣

尚有一種因素，即為求博之讀書風氣。

印刷術盛行後，對學術升降的影響頗大，張舜徽曰：

自宋以降，吾國學術，乃迥然與先唐異趣……學者易於求書，故博雅勝於曩哲。書冊易於傳布，故著述盛於昔日，尤其纂輯之業多，而創造之功少。……又因刊布過於捷便，故文之繁冗蕪蔓特甚。³⁷

³⁵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台北：新興書局，1969），頁1。

³⁶ 參見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38。

³⁷ 張舜徽：《廣校讎略》，楊家駱主編：《校讎學系編》（台北：鼎文書局，1977），頁系424。

纂輯之業多，故當時「讀書記」文體普遍，如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真德秀《西山讀書記》、黃震《黃氏日鈔》等。

其實此抄纂之法自古已有，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儒家言」條云：

按昔之讀諸子百家書者，每喜撮錄善言，別鈔成帙。《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雜家有《雜家言》一篇，小說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讀諸子書時撮鈔群言之作也。可知讀書摘要之法，自漢以來然矣。後人效之，遂為治學一大法門。《文心雕龍·諸子篇》亦言「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韓愈《進學解》復謂「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證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兩宋學者，尤勤動筆。《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微言》，乃溫公讀諸子書時手鈔成冊者也。此皆步趨漢人讀書之法，行之而有成者。³⁸

可見抄撮群言，傳統甚久。《宋志》創立「史鈔」一門，後代書目因之者亦多，章學誠則謂鈔撮之功，仍世益盛，應設立「書鈔」一門³⁹。即因抄書不僅於經史書籍，尤其至宋代，撮鈔最勤。張舜徽云：「大抵宋人治學，好勤動筆，每遇繁雜之書，難記之事，輒手鈔存之，以備觀省。其於群經諸子，莫不皆然。」⁴⁰如曾慥《類說》，體例略仿馬總《意林》，每書刪削原文，而取奇麗之語，《四庫全書總目》評曰：「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於裁鑒，故所甄錄大都遺文僻典，可以裨助多聞」。⁴¹黃震《黃氏日抄》「以所讀書隨筆札記，而斷以己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並有不存標目而摘錄一兩字者。」⁴²隨筆雜記，輯錄經史百家成言，各為論述。皆可見宋代蔚為風氣之讀書方法。

³⁸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277。

³⁹ （清）章學誠：《校讎通義》《文史通義校注附》（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958。

⁴⁰ 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81。

⁴¹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641。

⁴² （清）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219。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甲集》卷二十四：有「觀書當如猛將用兵，酷吏治獄」條⁴³下云：「眞是鑿戰一陳，直到推究到底始得」。下並引《曾裘父詩話》云：

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此法受到清代章學誠的批評，認為東坡以類求知法獲得知識，是「經生決科之業」，所以「未可進言於學問也」。⁴⁴但東坡是用兵在多，則讀書在廣。當時在求博的精神下，編纂書籍的型態上也有改變。

如衛湜所著《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其自序云：

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註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由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眾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⁴⁵

⁴³ 鍾肇鵬主編：《讀書記四種》第五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19。

⁴⁴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台北：里仁書局，1984），頁157。

⁴⁵ （宋）衛湜：《禮記集說·序》，《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2-16。

博求諸家之說，就是求讀書能折衷群言，並貫通經典。序又云：

或曰：是書粹聚諸家之善，逾數十萬言，毋乃務博而忘約乎？予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於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為曾子言之也。予欲無言，子貢有未省也。陵節而求，躐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儻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辨，絕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爾。蓋盡載程、張、呂、楊之說，而諸家有可取者亦兼存之。予之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為學者造約之地邪。猶愧寡聞，訪論未盡，然六經之典，敷暢發明至是麤備，或於聖代闕文小有補云。

務博不至於忘約，反而是造約之地，是為「約」鋪路。所以其書自鄭《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書之涉于《禮記》者，所採錄不在此數。其文獻類型包含解義、語錄、文集等。「凡及於禮經，可以開曉後學者」都是收錄的對象，可見衛湜務博的精神。衛湜《禮記集說·後序》云：

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後有達者，勿襲此編所已言，沒前人之善也。

可見衛湜不以襲取前人之言為意，企求如實的摘錄資料，提供後人為學之資。所以《四庫全書總目》稱讚他：「非唯其書可貴，其用心之厚，殆亦非諸家所及」。⁴⁶在這種務博的要求下，當然對淺陋者不滿，葉夢得《過庭錄》云：「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為通經。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⁴⁶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69。

《真文忠公讀書記》引山谷與李幾仲帖云：

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博而不精，又但求務博，總難免釋卷而茫然，然則讀書之法為何？所以《四庫全書總目·通鑑總類》條云：「然《通鑑》浩博，猝難盡覽。司馬光嘗言，惟王勝之曾讀一過，餘人不能數卷即已倦睡。則採摭精華，區分事類，使考古者易于檢尋。」⁴⁷在編纂上能「區分事類」，才能在浩瀚的文獻中，掌握文獻。朱子教人讀書：「讀書如理亂髮，理髮須逐條理，教條直。」⁴⁸則理亂之法，不可不知。勢必在繁亂的文獻中，尋出一種處理的系統。

輯錄體解題輯錄各家之說，以揭示文獻者，其性質如同《別錄》之敘錄。博引繁徵，纂輯成言，輯錄排比。期能達到「殫見洽聞」之境界，實與宋代會通思想、求博風氣相關。

四、書目解題之發展

在目錄書的體制上，論者常以體制有篇目、敘錄、小序、板本序跋等。⁴⁹本文專論敘錄部分，故其他項目之發展不論述。

《漢書藝文志·大序》云：

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⁴⁷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578。

⁴⁸ 鍾肇鵬主編：《讀書記四種》第五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19。

⁴⁹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28。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⁵⁰

而其中「撮其旨意」，亦即《隋書經籍志·序》所云：「每書就，向輒撰爲一錄，論其旨歸，辨其訛謬。」⁵¹根據今傳《戰國策書錄》、《管子書錄》中之敘錄佚文，余嘉錫論及義例有：論考作者之行事、論考作者之時代、論考作者之學術。⁵²此體一出，對於書之指歸訛謬，皆有論辨，剖析條流，至爲詳盡，甚有益於學術，故後世爲目錄者皆以之爲圭臬。至魏晉六朝之世，文籍逾廣，著重在典藏目錄。故《隋書經籍志總序》於論荀勗《中經新簿》云：「但錄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緇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於論王儉《七志》云：「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至論阮孝緒《七錄》則云：「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頗見其不滿⁵³。以文獻數量而論，《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家所附史學著作只有十二家五二〇篇，而《七錄》記傳錄，凡十二部，一二〇〇種，一四八八八卷，其數量大增，於此可見。且當時戰亂頻仍，朝代更替，勢難能如劉向之撰寫敘錄。故王重民以爲中古前期是編寫提要的衰微時期。⁵⁴至唐宋之世，文獻產量持續增加，加以代有盛世，則文獻整理及知識組織之需求，更屬必要。⁵⁵

中國目錄學注重致用，讀者著重在學術之追求，則具備文獻導讀功能之敘錄，即爲利器。唐元行冲修撰《群書四部錄》二百卷，此錄卷帙甚多，當有敘錄，但書久佚，無從詳悉。毋甦撰成《古今書錄》四十卷，依《四部錄》之缺失作刪略增補。書名之下也有敘錄論釋，但此錄宋末年已亡，其優劣不詳。至宋，《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皆有敘錄。其體制皆淵源於劉向《別錄》，並無大幅更張。但宋世之學術文化已然不同。唐代門閥

⁵⁰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台北：鼎文書局，1993)，頁1701。

⁵¹ (唐)魏徵：《隋書·經籍志》(台北：鼎文書局，1993)，頁905。

⁵²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36。

⁵³ (唐)魏徵：《隋書·經籍志》(台北：鼎文書局，1993)，頁907。

⁵⁴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67。

⁵⁵ 王新才：《中國目錄學：理論、傳統與發展》(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29。

制度的漸漸消失與科舉制度的推行，使得出仕者已不具世家傳統政治的能力。既是書生從政，以學問從事政治，故重博學、重經驗。如杜佑《通典》即此應運而生。⁵⁶回應在文獻類型上，如類書「爲文取資」的作用遞減，《冊府元龜》、《玉海》等類書有資於爲政者日多。⁵⁷

中國目錄學目錄學之價值既傾向功利主義，即以目錄書能達到什麼作用，若著意在學術的追求、文獻導讀上，敘錄自是一種必要的體裁。故至宋世，敘錄的傳統再度發揚。只是體裁已作更張。如目錄書《史略》、《玉海·藝文部》、《文獻通考·經籍考》亦因當時環境的改變，而在敘錄撰寫上有所回應。

高似孫《史略》首先運用了新的型態。《史略》六卷，全書參考《世本》、《山海經》、《史記》、《容齋隨筆》等共四十四種文史典籍。著錄書之下有解題或評論，對於較重要的史籍，又在解題之後，列舉該書的校本、注解本和音義本等參考書目。如卷一「《史記》一百三十卷」條：第一部分介紹《漢書藝文志》云：《史記》十篇缺、有錄無書之情形。次有：〈太史公自敘〉。諸儒史議：列出揚雄等十九家。班彪、班固、范曄、劉昭、張輔、葛洪、裴駟、王通、司馬貞、劉伯莊、韓愈、柳宗元、劉知幾、白居易、皇甫湜、鄭覃、殷侗、高佑、崔鴻等人論《史記》之文。再次引《漢書藝文志》載有馮商《續太史公》七篇，並介紹注史記裴駟等六家之書。及其先公（高文虎）《史記注》之敘。又再引《史記》雜傳，如《史記索隱》等六種。並再引《史記》考述，如譙周《古史考》。後再引《史記》音四種，如徐廣《音義》等。在「史記」編題下，則《史記》之序，諸家議論，讀《史記》，注考《史記》之資料，皆能一目了然。儼然爲一《史記》研究資料彙編。

王應麟《玉海·藝文部》也運用了此種體裁。亦以其中正史類「漢史記」條爲例：引〈司馬遷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志》、〈裴駟集解序〉、

⁵⁶ 參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1973），頁278。

⁵⁷ 參見黃永年：〈說類書和叢書的興替〉，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淡江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2。

〈司馬貞索隱序〉、〈張守節正義序〉、「晁公武」、「呂氏」、《史通》之文，或明篇章，或述義例，或敘著作之由，或補闕遺，則《史記》之大旨，可窺見無遺。

此二書皆將與主題有關聯者，匯合一處。如此用心，即在「博採文獻，以資考證」的面向上。

日人內藤虎次郎論及宋代史學之發展⁵⁸，其中目錄學一節嘗論《玉海》之體例：

……藝文之中又分各部門，各部門中列舉古來重要書籍，與高似孫之方法幾乎相同，以古人所撰之書為主，將其書之著作由來及撰成後之評論皆曾巧為取材。他對於所收之書雖未加論斷，但各書之大體、內容，性質已可瞭解。又據「藝文」中所載之順序，很自然地對各部門之變遷沿革可得而知之。他未加自己的意見，而用自然編纂法表現出來，方法巧妙。此非學養深邃者不能為功。對所見之書下評語較易，今自己不發揮意見，而要對古來人所書之意見表示一下自己的見解，則屬困難之事，也是高度的技巧。玉海中之「藝文」與高似孫《史略》有相似之點，即王應麟之書也欲將全部學問表現出來，遠較《史略》為有用。

將古人對某書之觀點，纂輯而成，讀者既可見前賢之意見，以資博見；又可循編者之意，涉學其中。以目錄書注重致用的作用來說，成效極大。但二書在蒐輯書目文獻的規範上，尚不成熟。

此外，敘錄體制的撰作是否應檢討的問題，在宋代也曾討論。鄭樵《通志·校讎略》〈泛釋無義論〉提出看法：⁵⁹

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

⁵⁸ 內藤虎次郎：〈宋代史學之發展〉，《宋代研究集》第六輯，（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頁20。

⁵⁹ （宋）鄭樵：《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726。

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且《太平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意，但以謂博採群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

又云：

《崇文總目》，必欲一一為之釋。間有見名知義者，亦彊為之釋。如鄭景岫作《南中四時攝生論》，其名自可見，何用釋哉？如陳昌胤作《百中傷寒論》，其名亦可見，何必曰百中者取其必愈乎？

因鄭樵指出《崇文總目》敘錄多無義，故朱彝尊以《崇文總目》敘錄之亡佚不傳，殆起於鄭氏。⁶⁰《四庫全書總目》更云：「（宋）高宗誤用樵言」，以致刪除敘錄之文。⁶¹如此誣陷，已經杭世駿、錢大昕辨證為非。⁶²分析前所引述鄭氏之意，可分：一、對於書已清楚歸類，則不必更一言之。二、兩書若不能說到差異之處，就不必強為之說。三、可見書名之義者，就不需強為之釋。故鄭氏是針對《崇文目》而言，並不見得反對有解題。而鄭氏另一篇〈書有應釋論〉云：

《隋志》於他類只注人姓名，不注義說，可以睹類而知義也。如史家一類，正史編年，各隨朝代易明，不言自顯。至於雜史，容有錯雜其間，故為之注釋。其易知者則否。惟霸史一類，紛紛如也，故一一具注。蓋有應釋者，

⁶⁰ （清）朱彝尊原著，侯美珍等點校：《點校補正經義考》第8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8），頁755。

⁶¹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129。

⁶² 參見鄭奮鵬：《鄭樵的校讎目錄學》（台北：學海出版社，1983），頁143-146。

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概之論。按《唐志》有應釋者，而一概不釋，謂之簡。《崇文》有不應釋者而一概釋之，謂之繁。今當觀其可不可。⁶³

即已說明解題之有無，當以是否需求為當。證其《藝文略》中加以解題者，有因內容、撰人、著述、稱謂、篇卷而為之解題等五項，此五項共有十八目⁶⁴，是知鄭樵對解題之有無，端賴是否需要。又如以《藝文略》來論，其解題甚為簡略，如同《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等史志之小注，不似劉向《別錄》之繁富。史志之無解題，乃因史志僅為史書之一篇，若有解題則卷帙過繁，本末倒置。此乃著書各有體要使然。鄭氏《通志》200卷，《藝文略》等同於一篇史志，書目下僅有小注，亦屬當然。如若從另一角度檢視，鄭氏指責《崇文總目》之解題，或即在於其解題不夠周延，而無助於考辨學術。書目解題之功用，余嘉錫言之最詳：

吾人讀書，未有不欲知其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處之時代若何，所學之善否若何者。此即孟子所謂知人論世也。古之為目錄學者，於《七略》四部之書，皆嘗遍讀。當其讀書之時，其心之所欲知，正與吾輩相同。於是旁搜博考，不厭求詳。既已左右采獲，則自惜其為之之勤，又知後之人亦甚需乎此也。於是本其研究之所得，筆之於書，以公諸世。故目錄書者，所以告學者以讀書之方，省其探討之勞也。若畏其繁難，置之不考，則無為貴目錄書矣。然古今目錄書，能與此義完全相合者蓋寡。⁶⁵

此有利於涉學指導之體制，在中國目錄學的傳統上不至於廢棄。

鄭樵、馬端臨二人在學術思想上都主張會通；但在書目文獻之實際編撰，鄭氏在直線上主張古今通收，不論存佚。，在橫面上則主張用詳明類例來剖析源流。馬氏的類例依照四部分類，無所創新。但在直線上除據宋代書目，及搜訪所得嘉

⁶³ （宋）鄭樵：《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727。

⁶⁴ 參見錢亞新：《鄭樵校讎略研究》，《校讎學系編》（楊家駱編，1977），頁系287。

⁶⁵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40。

定以前之書，「詮校而志之」外，則主張解題的撰寫要博採古今資料。其自序云：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言，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

而其取材宏富，主要徵引十一家書目。除此之外，古今學者的考證和評論也廣泛引證。徵引之著作，明確標出書名者，共四十四部，共稱引二七七次，而徵引序跋、書信、墓銘，或只言片語者計八十五家，共徵引四八一次，其中序跋達二二七篇。⁶⁶這些豐富的資料，排比輯列，引用在各書條目之下。自己有議論者，在逐寫原文後，間附按語，略述己意。可謂「各書內容之梗概，覽此一篇而各說具備」⁶⁷，務使讀者能知「著作之本末，流傳之真偽」。如卷五十九「《韓昌黎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條，引晁公武《讀書志》，李漢〈文集序〉，《唐書》本傳〈贊〉、《歐公詩話》、陳振孫《解題》。則退之之生平、詩文風格、卷帙之流傳，皆能包涵。《經籍考》所錄引文，每能呈現作者生平、著書大旨、著書緣由及書之得失。因其材料輯錄眾說，故可稱為解題之輯錄體。

有如此的發展，端賴當時文獻的齊備。一是書目眾多。喬衍琯先生認為「宋代所編書目，文獻可考的將近百種，實際上應當數倍於此，然今多已亡佚，而有傳本或輯本的，也近四十種。這些資料或單行，或收入叢書，或自一書中裁出，而都有資考證，為圖書文獻、學術研究上重要材料。」⁶⁸二是說部文獻大量出現，

⁶⁶ 王承略：〈試論《文獻通考·經籍考》的著錄依據和著錄方法〉，《古籍整理研究論叢》第二輯（山東：山東文藝出版社，1993），頁207-214。

⁶⁷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220。

⁶⁸ 喬衍琯：《宋代書目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1。

以宋代而言：雜著筆記近百種，文獻價值極高。以圖書文獻言，有辨僞、佚書、制度、傳記與目錄版本資料。以非圖書文獻言，有石刻、金器、建築、語言、書畫等資料。皆可供考文徵獻者取資。⁶⁹馬氏生當宋末，其父馬廷鸞曾為宰相，故有利於掌握宋時資料，而成就其目錄解題編纂之創新。

輯錄體至明代，王圻《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二卷，雖收各書之序跋，及間錄他人之評論。但其書重在介紹作者，多用傳錄體之形式。另外朱睦㮮《序經錄》、張雋《古今經傳序略》，大量收錄經書序跋，姚名達論此二書云：「雖非純粹目錄體裁，而實開通考古今經書、移錄原序之創例。清初朱彝尊遂仿其遺意，為目錄學開闢一新大陸焉。」⁷⁰是此二書，以輯錄體角度觀察，亦是為例不純。

至清，目錄學受到考據學之影響，學術思想注意探本溯源，故出現對文獻大規模和深入的爬梳整理。目錄解題之體得以全面發展。解題之綜述體則有《四庫全書總目》為巨擘。輯錄體解題，在專科目錄有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等。私家藏書目錄，則有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等。地方藝文志則以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最為著名。而清代興起之補史或考證藝文志，如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等也以輯錄體為體裁，使歷代典籍本末源流清晰可見。延及近世，王重民《老子考》等，亦以此體為依歸。林林總總，已蔚成大國。

其中輯錄體解題由綜合書目轉至專科目錄，意義重大。余嘉錫云：

張之洞謂有藏書家之書目，有讀書家之書目。余謂藏書家之書目，如今圖書館所用者，但以便檢查為主，無論以筆畫分，以學術分，或以書類人，或以人類書，皆可；兼而用之尤善。俟治圖書館學者討論之。若讀書家之書目，則當由專門家各治一部，兼著存、佚、闕、未見，合《別錄藝文志》與《儒林文苑傳》為一，曲盡其源流，以備學術之史。此意已於目錄學之體制諸篇言之詳矣。⁷¹

⁶⁹ 參見劉兆祐：〈宋代雜著筆記所徵引佚書二十一種考述〉，《國家圖書館館刊》96年第2期（2007年12月），頁60-87。

⁷⁰ 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269。

⁷¹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166。

意即讀書家之書目，應由專家編撰，體例中應有存佚概念，參諸古今書目，詳明作者之生平，博採文獻以爲敘錄。可作爲學術史之素材。

五、結語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總序》云：「史之爲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詳則求博，且博而求實。余嘉錫亦云：

夫考證之學貴在徵實，議論之言易於蹈空。徵實則雖或謬誤，而有書可質，不難加以糾正。蹈空則虛驕恃氣，唯逞詞鋒。……故自揣學識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證而少議論。於事實疑誤者，博引群書詳加訂正。至於書中要旨，則提要鉤玄，引而不發，以待讀者之自得知。」⁷²

以目錄解題爲例，余嘉錫云：「古之爲目錄學者，於《七略》四部之書，皆嘗遍讀。當其讀書之時，其心之所欲知，正與吾輩相同。於是旁搜博考，不厭求詳。既已左右采獲，則自惜其爲之之勤，又知後之人亦甚須乎此也。於是本其研究之所得，筆之於書，以公諸世。故目錄書者，所以告學者以讀書之方，省其探討之勞也。」⁷³輯錄體解題輯錄各家之說，以揭示文獻者，其性質如同《別錄》之敘錄，所不同者爲撰寫方法。一則綜述各家之說，以融於己意，而成一篇。一則將各家之說，輯錄排比，己意則附爲按語。二者優劣，余嘉錫言之甚詳⁷⁴：

夫班固《漢書》採史公之〈自敘〉，錄《法言》之篇目，誠以學問出於甘苦，得失在乎寸心，自我言之，不如其人自言之深切著明也。論賈誼、東方朔，則徵信於劉向。論董仲舒則折衷於劉歆。誠以則古稱先，述而不作，

⁷²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57。

⁷³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40。

⁷⁴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1987），頁82。

前賢既已論定，後人無取更張也。考訂其文，尤重證據。是故博引繁稱，旁通曲證。往往文累其氣，意誨於言。讀者乍觀淺嘗，不能得其端緒。與其錄篇內，不如載之簡端，既易成誦，又便行文。此所以貴與創之於前，竹垞踵之於後，體制之善，無間然矣。

博引繁徵，纂輯成言，述而不作，且條列而出，則又不妨礙文氣。這都是輯錄體解題的優點。而此目錄新體制即與當時發展中之社會文化環境有相當關聯。

文獻為社會之產物，其形態產生伊始，雖談不上有社會普通性，但卻是走向具有廣泛社會性之方向發展，此即為文獻之社會化。⁷⁵故而社會文化環境對文獻體裁之變化，皆有顯著影響。集解、類書等成熟之文獻類型的相互牽引，宋代文獻會通思想、求博讀書風氣的催化，皆有助於目錄解題新體制的出現。馬端臨創例於前，後世迭有佳作。有清一代，蔚為大國。可見輯錄體解題頗受目錄學家之喜愛，為中國目錄學優良之傳統——解題，再展現光芒。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台北：鼎文書局，1993。

梁·沈約，《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

唐·魏徵，《隋書·經籍志》，台北：鼎文書局，1993。

唐·劉知幾，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

宋·衛湜，《禮記集說》，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鄭樵，《通志略》，台北：里仁書局，1982。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69。

清·朱彝尊，侯美珍等點校，《點校補正經義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⁷⁵ 參見賀修銘：《文獻生產的社會化及其影響》（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頁16。

清·永瑤，《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章學誠，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

清·章學誠，葉瑛校注，《校讎通義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

二、近人論著

1. 專著

王重民 1984《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

王新才 2008《中國目錄學：理論、傳統與發展》，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鍾翰 2004《清史補考》，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中津濱涉 1974《藝文類聚引書索引》，台北：文光出版社。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淡江大學中文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 2002《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沈家本 1967《沈寄簃遺書》，台北：文海出版社。

吳懷祺校補 1992《鄭樵文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余嘉錫 1987《目錄學發微》，台北：藝文印書館。

昌彼得 1997《增訂蟬菴群書題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胡道靜 1982《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

姚名達 1981《中國目錄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梁啟超 1941《飲冰室專集》，上海：中華書局。

陳仕華 1993《王伯厚及其玉海藝文部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喬衍琯 1987《宋代書目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張舜徽《廣校讎略》，楊家駱主編 1977《校讎學系編》，台北：鼎文書局。

張舜徽 2004《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舜徽 1983《史學三書平議》，北京：中華書局。

馮浩菲 1997《中國古籍整理體式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賀修銘 1997《文獻生產的社會化及其影響》，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

董洪利《古籍的闡釋》，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程金造 1998《史記索隱引書考實》，北京：中華書局。

錢亞新 1977《鄭樵校讎略研究》，台北：鼎文書局。

錢穆 1973《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

鍾肇鵬主編 1998《讀書記四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鄭德坤 1974《水經注引書考》，台北：藝文印書館。

鄭奮鵬 1983《鄭樵的校讎目錄學》，台北：學海出版社。

2. 期刊論文

牟潤孫〈論儒釋兩家之講經與義疏〉，《新亞學報》4卷2期，1960年2月。

戴君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的性質和形式〉，《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3卷第3、4期，1970年10月。

王承略〈試論《文獻通考·經籍考》的著錄依據和著錄方法〉，《古籍整理研究論叢》，1993年。

吳懷祺〈章學誠的易學與史學〉，《史學史研究》第1期，1997年。

周生杰〈合本子注疏論〉，《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6年。

劉兆祐〈宋代雜著筆記所徵引佚書二十一種考述〉，《國家圖書館館刊》96年第2期，2007年12月。

On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Abstracts-Jilu.

Chen, Shih-Hu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bstracts can be divided into zongshu , chuanlu and jilu. Jilu has a long histor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jilu, most scholars think that it comes from “Chu Sancang jijì”. However,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book, where jijì was used, and the only origin. The appearance of jilu is connected with the academic thoughts at that time, the biographical style, scholars’ dependable earnest work attitude and the maturity of types of documentation, such as jiji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leishu, etc.

Keywords: bibliography, abstract, the Abstracts-Jilu

